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北洋之利

—— 古代渤海区域的海洋经济

杨强 /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海洋
中国
与世界

丛书

杨国桢

主编

北洋之利

——古代渤海区域的海洋经济

杨 强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杨国桢 主编

海洋
中国
与世界

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洋之利：古代渤海区域的海洋经济/杨强著.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5.12
(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杨国桢主编)
ISBN 7-81075-711-3

I.北... II.杨... III.①渤海—海洋经济学—研究—古代②黄海—海洋经济学—研究—古代 IV.P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16674号

海洋
中国
与世界

北洋之利

——古代渤海区域的海洋经济

杨强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96号)

邮编：330046 电话：(0791) 8513396 8504319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太元科技有限公司照排部照排

印刷：江西教育印刷厂

2005年12月第1版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16.625印张 293千字

印数：1-2500册

定价：44.50元

ISBN 7-81075-711-3/P·004

(江西高校版图书如有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总 序

20 世纪后期，科技日新月异，生产力大幅提高，给人类带来巨大财富，又给人类的生存带来潜伏的危机。随着陆地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增大，未来文明的出路在于海洋，已成为国际共识。21 世纪的海洋开发与竞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焦点之一。中国是一个陆地大国，又是一个海洋大国，西部大开发与东出海洋是实现经济腾飞、民族复兴的两翼，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走入海洋，走向世界，是历史的大趋势。中国能否抓住发展机遇，建成海洋强国，与海洋世界产生良性的互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能否经受西方海洋霸权的挑战，消解遏制与对抗，在海洋竞争中占有自己的生存之地，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这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

究,是21世纪理论创新和学术创新必须认真面对的重大课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对历史的学术兴趣从陆地转移到海洋,对海洋发展陆地化描述的历史文本产生了怀疑,开始酝酿对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洋人文社会学的探索。由于自知这是一项艰难的研究计划,需要聚集力量,长期冷静思考,不断探索,不能为浮躁之风所动,以时髦理论虚构历史,或急于求成,追求轰动效应,故设想结合博士生的培养来进行研究,指导他们各选择一个专题,用3~4年时间,一步一个脚印、一届又一届地做下去。我的设想和思路得到博士生们的响应和认同,师生几经切磋,于是有一批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虽有几个失败无成,但大多间有新见,为中国海洋人文社会科学建设做了基础性的学术积累。

1996年,江西高校出版社独具慧眼,支持我挑选一些博士学位论文加以修改,编成丛书,申请列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并主动承担出版任务。在他们的热心支持和鼎力帮助下,《海洋与中国丛书》(8册)在上个世纪末面世,并荣获第十二届中国图书奖。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鞭策和鼓舞,促使我下定决心与时俱进,拓展研究计划,争取2010年前在主要领域都有开拓性、创新性的成果,夯实中国海洋史学的基础。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套丛书(12册),便是《海洋与中国丛书》的延续,又是厦门大学“211工程”第二期建设项目的成果之一。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以海洋中国与海洋世界的互动为研究平台,进一步深化中

国海洋历史文化的研究;破除忽视海洋发展的观念、心态和认识的盲点,用翔实的历史人文资料,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论证海洋是沟通中外的大通道,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海洋对经济社会发展、稳定和安全具有重大的国家利益,海洋国土是历代先人开拓经营的结果,海洋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海洋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突破国家、民族的界限和传统的学科结构,实现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渗透和融合,推动海洋史学的学科建设和博士生培养;分析中国海洋发展与海洋世界互动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实践提供借鉴。

纳入本丛书各书,是从博士学位论文和国家、教育部社科研究规划及国外合作项目成果中选取的。作者大多风华正茂,都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善于吸收国内外学界的新成果、新经验,有的已有多年的积累,又经多年潜心研究,虽然水平难求一致,但均有创新的亮点。本丛书的内容分别涉及中国历史上的海疆政策、海洋经济管理、海神信仰、海上走私与反走私、海洋灾害,东南海洋区域、海上山东、环黄渤海经济圈的生态环境、经济开发与社会文化变迁、环中国海沉船、南海纷争与海洋权益、西洋航路移民、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的研究,多属立足学术前沿,扣紧时代脉搏的问题。在指导思想、研究主题、研究概念、研究方法、研究顺序上,实现从陆地本位向海洋本位的转换,把海洋视为一种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的进程,而不仅是单纯的区域概念或产业概念;站在

历史学的立场,整合海洋考古、宗教史、环境史、灾害史、科技史、海洋经济地理、海洋法学、人类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知识和成果,填补研究空白,为海洋史学整体框架添砖加瓦,体现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的特色和风格,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勇于面对时代需要,追求传统与变革连续性的新思路,发挥学术的社会功用,有较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了增强学术著作的可读性和扩大读者群,作者在通过论文答辩或课题成果评审之后,又对标题和文字作了大量的加工,或作章节调整,重新改写。所有引文都经查核原书,反复校对,力求准确无误。

我们深知,上述内容在中国海洋历史文化领域还仅是沧海一粟,要完成最初的构想还任重而道远。一代有一代的学术,让非主流的海洋史学登上中国的学术殿堂,是我的梦想。感谢厦门大学的研究经费资助和江西高校出版社的精诚合作支持,给我圆梦的机会。人文社会科学对研究对象的阐述和说明不会有终极的结论,只要学术界承认我们努力过,尽心了,就是最高的褒赏。至于是否能够二十年磨一剑,形成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特色的中国海洋史学,还要看今后的努力和学术的检验。

由于海洋发展在国史上长期处于非主流地位,造成资料信息的大量流失和断层,今人所能见到的只是一些断面或碎片。即便如此,从民间和海外发掘史源,还有很大的难度。由于资料分散,检索不易,不少还需实地调查才能获得,受到人力、时间和资金的制约,埋藏地下和海底的文物证据更有待考古的新

发现,加上文理、古今、中外之间,学科专业分工过细,往往有好的选题,却一时难竟全功。特别是外国档案文献的利用,缺乏通晓葡萄牙、西班牙、荷兰、阿拉伯等语言的学术专才,需要培养引进方能解决,有关从海洋世界看中国的许多课题只好延后处理。此乃时势使然,非“不战”之罪,敬请读者见谅。

历史事实是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出发点,海洋史学的成熟有助于海洋人文社会学科的发达。这是可以期待的。我们希望以书为媒,广交关注海洋的学术与职业背景不同的有识之士,开展学术交流和合作,共同为提高海洋意识,弘扬中国海洋文化,繁荣海洋事业而努力。作为新兴学科,有许多新的发展空间,需要许多新人的参与、继承、开拓和超越。相信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海洋史学将在中国大放光彩。

楊國楨

2003 年元旦

致读者

从20世纪80年代起,发展海洋经济逐渐成为我国沿海地区拓展生存空间、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的主要举措之一。在渤海湾区域,辽宁省于1986年提出建设“海上辽宁”的战略目标;河北省提出“立体开发海洋,陆海经济一起抓”的设想;天津市提出加快海洋开发,使海洋经济进入全面发展新阶段的构想;山东省于1992年提出建设“陆上一个山东,海上一个山东”(即后来的“建设海上山东”)的战略构想。这些海洋经济战略目标的提出,均建立在当地海洋区位、海洋资源和海洋环境的基础之上。这就引起我们对古代北方海洋开发的兴趣。历史上,面对与当代相似的海洋环境,沿海先民们如何应对?他们对身边的海洋环境是漠然处之,还是将海洋区位优势转换为经济发展的优势?本书即基于这些疑问,以渤海湾区域为研究对象,来勾勒该区域古代海洋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

我国古代有“北马南船”一说,它可被视为时人对北方与南方经济发展特点的一种总的概括。这一说法是否是对古代北方沿海海洋经济发展的忽视甚

或否定？如果不是，历史上的北方海洋经济发展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它和南方的海洋经济发展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差别？通过对学术史的初步考察，答案不仅没能立刻呈现，反而增加了新的困惑。总览已有中国海洋史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重南轻北的研究倾向：东海、南海海洋成为重点研究对象；对北方海洋的研究数量少，整体性、长时段的相关研究更属空白。¹研究的缺乏是否同样意味着北方海洋经济发展传统的缺失？在阅读文献资料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一种看法：古代北方沿海地区有自身的海洋经济发展传统，它的发展模式与南方海洋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同的两种类型。而要揭示北方海洋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比较南北海洋经济发展的异同，首先就需要做具体的实证研究。所以，追寻历史上渤海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途径，分析其成因，并进一步为其在中国海洋经济史上定位，是本书的研究目的之一。

本书着力于渤海区域海洋经济史的建构，同时，中国海洋史的相关问题也是我思考和讨论的内容。其中，中国古代海洋文明发展问题是核心。

人类对海洋文明的关注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15世纪末以降，欧洲沿海国家通过一系列海外探险活动，开辟了沟通世界的新航路。在随后的数百年间，凭借着远洋贸易和殖民掠夺等手段，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相继成为海上强国，并进一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毋庸置疑，欧洲所取得的成就与其海洋发展路向的选择息息相

关。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对海洋文明也开始了日趋深入的探讨,其关注范围也逐渐从欧洲扩大到世界其他沿海国家和地区。然而,仔细分析有关的讨论,以欧洲海洋发展模式作为世界海洋发展标准模式的思维方式主导着学术界。比如,商业性是欧洲海洋文明最主要的特征,是否具备商业性则成为学术界衡量海洋文明存在与否的主要标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即反映了这种思想。黑格尔认为,海外贸易行为仅限于欧洲范围,亚洲各国并没有这种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从事贸易的商业活动。他以中国为例,认为在中国人看来,海洋只是陆地的中断,是陆地的“天限”,中国人与海洋不发生积极的关系,中国已经过渡到农耕文明的形态,海洋并没有影响到她的文明:

农业在事实上本来就是指一种流浪生活的终止。农业要求对于将来有先见和远虑,因此,对于普遍的东西的反省觉醒了,所有权和生产性实业的原则就孕育在这当中。中国、印度、巴比伦都已经进展到了这种耕地的地位。但是占有这些耕地的人民既然闭关自守,并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无论如何,在他们的文明刚在成长变化的时期内),既然他们的航海——不管这种航海发展到怎样的程度——没有影响于他们的文化,所以他们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关系,完全只由于其他民族把他们找寻和研究出来。²

黑格尔认为中国文明属农耕文明,尽管有航海等海洋活动,但没能像欧洲那样进行海外商业活动,故而没有形成自身的海洋文明。很显然,他将西方的商业性海洋文明作为海洋文明的惟一模式。这里有必要了解的一点是,黑格尔所指的“文明”、“文化”与目前中国海洋文化研究者的“文明”、“文化”是不同的。黑格尔所称的“文明”、“文化”实则指一种大的文明形态,中国学者所指的海洋文化则包括了与海洋有关的所有文化,二者所指的海洋文化是不同的两个概念。³这个区别在我们评判黑格尔关于海洋文明论断之前首先要清楚。

进入20世纪,中国学者对海洋文明的讨论也日趋升温。一些人文社会学科学者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出发,对古代中国海洋文明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以下仅就几个代表人物的基本观点作一介绍。

已故民族学家凌纯声先生是最早阐述中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学者。凌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是多元的,文化的形成是累积的,最下或最古的基层文化,可说是发生和成长于亚洲地中海沿岸的海洋文化”,而“亚洲北地中海”是中国文化或东亚文化甚至环太平洋古文化发生和成长之地。“亚洲地中海”是凌纯声先生海洋文化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的“亚洲地中海”,即自北向南向西,沿阿留申群岛—千岛—日本—琉球—菲律宾—帝汶—爪哇—苏门答腊等岛屿和大陆之间的海洋,这一片海洋被视为亚澳两洲间的地中海。“亚洲地中海”被台湾岛分为南北两部分,台湾岛以北的部分称为“北地中海”,又称

“北洋”，即今天的渤海、黄海和东海海域。凌先生进一步指出，我国古代海洋文化的创造者是“夷”，夷滨海而居，他们的文化是海洋型的。“所谓的海洋型是夷的生活方式都与海洋有关”，其文化特质主要有“珠贝”、“舟楫”、“文身”，与华夏民族的大陆文化三特质“金玉”、“车马”、“衣冠”相对。⁴之后，李东华先生以凌纯声先生“海洋中国”观点为基础，以隋唐以前的几个关键时地为对象，具体分析了海洋发展的史实，指出“从海洋中国的观点来看，海洋绝不是中国的‘海疆’”⁵。

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大陆海洋经济的发展，人文社科领域对中国海洋文明的讨论也渐趋热烈。宋正海、杨国桢等学者对中国古代海洋发展问题的阐述最具代表性。

宋正海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海洋学史的研究。在这种学科背景之下，他开始对中国海洋文化史进行探讨，其所研究的海洋文化范围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学艺术、意识形态、宗教、风俗习惯、科学技术等方面。宋先生认为：“东方也有海洋文化，也有蓝色文化。中国发达的传统海洋文化的存在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世界海洋文化并非只有西方的一个模式，中国古代还有另外一个重要模式。”⁶这里，宋先生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即海洋文化发展模式具有多样性，世界海洋发展模式不必拘囿于欧洲海洋发展模式这一种，可以有不同的发展路径。这一点认识无疑是一大进步。在文化学领域里，曲金良先生对海洋文化史也进行了讨论。在《海洋文

化概论》中,曲先生强调了海洋在人类文明的起源、文明模式的建构和发展过程中均起着巨大作用。⁷

杨国桢先生多年致力于海洋史学的研究,他对中国古代海洋文明问题的思考有诸多独到见解。杨先生认为:中华文明实则是一个多元一体格局,农业人文、游牧人文和海洋人文三大基本人文类型是中华文明的不同源头。之所以产生这三种不同的人文类型,在于人类用力方向的不同。沿海地区人们的活动场所是海洋,他们的用力方向也在海洋。尽管农业人文类型是中华文明的主体,但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海洋人文并没有消失,“而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更为各自独立地发展提供了空间和时间”⁸。他认为农业文明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向海洋发展的小传统却一直在局部沿海地区和民间层次得以保留和发展,从来没有被割断。⁹对于海洋文明史的研究,杨先生建议将视角放在沿海地区和民间层次上。这个建议对于推动海洋文明史研究走向深入有着重要意义。另外,张炜、方堃两先生的海疆史研究也涉及到对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初步讨论。他们认为,中国古代虽然很早就形成以内陆为中心的集权国家,但这并不影响沿海地区的海洋经济的进步和区域性海洋传统的形成及海洋文明的一般性发展。¹⁰

从以上对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讨论中不难看出,目前的学术界力图摆脱海洋文明研究中“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均强调海洋文明发展的多样性,赞成古代中国有自身的海洋发展。本书希望通过对历史

上渤海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实证研究,加入到关于中国古代海洋发展的讨论中,进而阐述自己对该问题的观点。

二

杨国桢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中国海洋史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研究,他倡导的以海洋为本位的海洋史研究已为许多学者所重视和认可。¹¹从2001年10月起,我有幸参加了杨国桢先生主持的“九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历史上东南沿海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研究》¹²,其间,我们关于中国海洋经济史理论、概念以及具体操作等问题的讨论让我受益匪浅。另外,杨国桢先生系统阐述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论文,以及由他主编的《海洋与中国丛书》以及《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对本书的理论架构有很大的启发,本书的理论方法和一些重要概念即是在杨先生所倡导的海洋史理论框架下形成的。在本书中,我力图避免传统研究方法的局限和不足,转换研究思维,根据具体研究对象制定自己的研究规范和基本概念,从而尝试着将渤海区域海洋经济史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研究。

(一)理论、方法的说明

1. 以海洋为本位的研究意识

本书和以往海洋史研究最大的不同在于以海洋为本位的思维。以海洋为本位,即以海洋发展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为研究的主轴。本书中,以海洋为本

位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历史文献中海洋信息的正确解读。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海洋信息分散、不成系统。在这些记载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古代沿海官员和知识分子之手。由于海洋在古代精英文化中的弱势地位,这些古代海洋文献记录者往往具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农业思想,故而,流传到今天的海洋文献带有鲜明的陆地化叙述痕迹。今天,我们从这种陆地化的描述中提取海洋信息时,必须突破这种叙述模式和思维,发掘其真实含义。如果仅仅停留在文字层面去望文生义,往往会推演出不符合史实的结论。

(2)走出海洋发展研究附属于陆地文明研究体系的藩篱,建立一个完整的渤海区域海洋经济史体系。现有的中国海洋发展史研究,涉及到海外交通史、航海史、海疆史、海外贸易史、渔业史、盐业史、海防史、海港史、中外关系史、华人华侨史等领域,这些领域实则被置于农业文明的研究体系之下,分属于农业史、手工业史、军事史、外交史等分支,彼此间缺乏照应,更冲淡了海洋因素所起的关键作用。目前,尚鲜有学者超越这些研究领域,将其视作一个完整的海洋发展体系来加以研究。我们认为,目前这种分支研究,无法全面窥究历史上渤海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轨迹,更不能为该海洋区域在中国历史上正确定位。渤海区域的自然环境、海洋经济中的各门类以及其他海洋经济发展因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海洋经济发展体系,理应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本书结

构的安排正是基于这一想法。

(3)力争摆脱现有历史研究以王朝兴替为标准的时间体系的束缚。中国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多以王朝更替为时间主轴。这个时间体系对于处理诸多与王朝兴替密切相关的史实、构建中国通史来说是有效的。但中国的海洋史有自身的发展脉络,它与王朝发展之间并不一定吻合,所以,以王朝兴替为标准的时间体系不适合中国海洋史研究。本书旨在构建渤海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故应该摆脱以王朝兴替为时间主轴的叙事方式,运用适合海洋史自身发展的时间体系。截至目前,有关海洋史时间分段的说法还不甚明确,而区域之间也存在着差异,海洋史研究无成法可循。故本书在总体上,结合渤海区域海洋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并参照中国乃至世界海洋史发展的大体脉络,探索自己的时间体系。需指出的是,部分海洋经济的发展规律与王朝发展的时间体系也有较为紧密的关系。以海盐业为例,所谓的“煮海之利,历代皆官领之”¹³,自西汉以降,海盐业的发展即与历代王朝的兴衰有密切关系。故本书对海盐业的研究,仍以王朝兴替的时间为基本脉络。

中华文明形态具有多样性,向海洋发展仅是取向之一,本书研究的重点在于向人们展示这种海洋取向。而以海洋为本位的意识则是本书的一种研究思维,它是对“站在大陆看海洋”、海洋研究陆地化的纠正,绝非意味着我们无视农业文明对海洋文明的影响、忽略农业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优势地位。